



尋求兩岸民主轉型的機會之窗： 從團系興衰看政治甄補 之重要性

蔡文軒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陳蓉怡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文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對民主化與威權轉型的文獻回顧，本文認為既有文獻的解釋模式均存在盲點，忽略了應從兩岸的政權屬性此一更高的視野進行探討。本文的第二部分便嘗試提出新的解釋方式，亦即從幹部輸送的成敗，來回答兩岸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與否。

本文認為，由於中國大陸共青團的組織力量健全，成功為中共政權培植一群「黨性」堅定的後備幹部，在領導體系的穩定下，有利於維繫一黨專政的體制。台灣救國團在1960年代後的職能迅速瓦解，當國民黨開始甄補黨外菁英的同時，也鬆動了領導體制的穩固。團系的興衰，開啟了兩岸民主化與否的「機會之窗」。

關鍵詞：兩岸政治發展、民主化、政治菁英、團系



Window of the Opportunity of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s: The Role of the Tuanpai (League Faction)

Tsai, Wen- Hsuen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en, Rung-Yi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answer why Taiwan has been moving toward democratization while China is not. The first part is a literature review of Taiwan's democratic transition. We find these theories capture specific aspects of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while they often fail to take the most important vision: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regime. The second part presents a theory about the role of elite transmiss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CCYL)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after 1978 and China Youth Corps (CYC) in the Kuomintang of China.

We found CCYL has succeed in both providing talented cadres to the party state and in recruiting youth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specialties to serve in the CCYL. CCYL, as a talent pool, has facilitated renewal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CCP. In contrast, The influence of CYC has waned since the 1960s. Meanwhile, Non governing elites was recruited in Kuomintang and challenged the KMT's leadship regime. In other words, CCYL a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elite-transmission, accounts for the fortunes of the party state.

Keywords: cross-strait political development, democratization, political elite, Tuanpai



壹、前言：問題的再省思

為何台灣走向民主化？而中國大陸卻維持一黨專政？許多文獻已經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但筆者在反覆思索後，認為這些文獻都有一些盲點，且無法從一個更高的視野——兩岸的政權屬性——來回答這個有趣的問題：為何國民黨與共產黨政權同屬於列寧式黨國體制，但兩岸的政治走向卻南轅北轍？筆者將在本文提出一個亟待開發的途徑，也就是從「團系」的興衰來回答這個問題。

「團系」是青年團的簡稱。在列寧式黨國體系的內部，存在著「青年團」的組織，用來擔負幹部輸送的功能。¹ 以中共為例，共產主義青年團（共青團）是其團系組織；² 而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團系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三青團），政府遷台後，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救國團）成為國民黨的團系組織。³

本文試圖提出一個新的觀點：由於共青團的組織力量健全，因此一直能提供幹部輸送的力量，為中共政權培植一群「黨性」堅定的後備幹部，即便在改革開放後承受了國際、國內的民主化壓力，由於領導體系的堅強，所以仍能維繫一黨專政的體制。但救國團在1960年代後的職能迅速瓦解，這對於國民黨的後備幹部培育造成了斷層，並使得國民黨在1970年代末期甄補了黨外菁英，從而鬆動了領導體制的穩固。團系的興衰，開啟了兩岸民主化與否的「機會之窗」。由於本文的性質僅限於理論的初探，因此不涉及細微的資料整理。筆者將先指出目前文獻在解釋兩岸民主化與否的一些觀點，以及相關的不足之處。其次，將聚焦於本文的論述：團系興衰與兩岸民主化的關連。

貳、既有論點：意識型態的解釋

¹ Matthias Neumann, "Revolutionizing Mind and Soul? Soviet Youth and Cultural Campaigns during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1921-8," *Social History*, Vol. 33, No. 3, 2008, pp. 244-267; 寇健文, 「共青團幹部與中共政治精英的甄補：團中央常委仕途發展調查」, *中國大陸研究*, 第44卷第9期, 2001年9月, 頁1-26。

² 唐勃, *中共共青團之研究* (台北: 幼獅文化, 1986年)。

³ Thomas A. Brindley, *The China Youth Corps in Taiwan* (New York: Peter Lang, 1999).



從意識型態的角度來說，政權變遷的要因在於既有政權的意識型態，存在著有益於民主發展的要素。意識型態是一種政治上的信念體系，它對於政治變遷的方向應如何進行，提供了一套整體性的指導方針。⁴ 意識型態的改變，有可能為政治變遷提供了一個契機。例如過去在中東國家，伊斯蘭主義與民族主義是意識型態的兩大要素，但既有意識型態在過去數十年受到自由主義的侵蝕，使得阿拉伯世界出現了政治轉型的契機。⁵ 這類文獻試圖將意識型態與政治變遷之間，建立起因果關係。

從這個角度來看，意識型態的因素似乎可以說明兩岸政治變遷的不同。三民主義、共產主義，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主要意識型態，其內涵卻極為迥異。首先，三民主義並沒有強調無產階級專政或是一黨專政，這和傳統列寧主義政黨有根本區別。⁶ 因此，台灣的在野黨不同於大陸的參政黨，而擁有分享政治權力的空間。此外，三民主義對於政治發展的遠景也不同於共產主義。孫中山設定了不同的政治發展階段，也就是軍政、訓政、憲政，政府在每個階段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但其最後的理想是「還政於民」，實施真正的民主政治。⁷

再其次，共產主義的本質存在著強烈的「目標文化」(goal culture)。共產主義企圖消滅私有財產制，因此現代化理論所期待的結果——人民為了保障財產權而要求政治參與，最終出現民主化——並無實踐的可能性。三民主義並不取消私有財產制，而是藉由國家資本主義的力量去實踐社會分配的平均分配。⁸ 這些因素，使得三民主義和民主政治的光譜較為接近，而共產主義卻反其道而行。

⁴ Andrew Heywood, *Political Ideolog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1992), pp. 2-8.

⁵ Michaelle L. Browsers, *Political Ideology in the Arab World: Accommod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⁶ Edmund S. K. Fung, *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9.

⁷ 朱昌淩，「三民主義和政治發展：對中華民國及中共民主發展的觀察」，張京育主編，*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海峽兩岸的實踐與比較*（臺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年），頁68。

⁸ Tun Jen Cheng,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Vol. 41, No. 4, 1989, pp. 477-468; 任卓宣，*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台北：帕米爾書店，1979年），頁211-272。



從意識型態來解釋政治發展，恰似合理，但卻有令人存疑之處。簡單的說，意識型態是否真能制約執政者的施為？執政者是否會依據官定的意識型態來進行改革？恐怕值得深究。我們的觀點認為，意識型態只是一個空泛的政治立場，執政者可以依據實際需要來調整意識型態的內容，因此它不一定能夠對於實際的政治發展造成關鍵性的影響。Schurmann 將中共的意識型態分為「核心意識型態」(pure ideology) 「實踐意識型態」(practical ideology)，前者是一種教條原則，後者才是具體實踐的基礎。⁹ 他認為在「實踐意識型態」的部分，中共一直在推陳出新，以適應新的政治情勢。中共的政治決策，並不受到任何既定意識型態的制約。

從改革開放之後，我們更能看出中共在調整「實踐意識型態」的努力。鄧小平主政後，將中共在過去奉為圭臬的「毛澤東思想」放置在「核心意識型態」，以避免黨內幹部用「毛思想」來箝制政治發展。之後，領導菁英一直在填充與衍伸「實踐意識型態」的內涵。中共在十二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十三大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江澤民在八九民運之後提出了「論十二大關係」；¹⁰ 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十六大訂為黨章的「三個代表」，與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都能夠視為是中共的「實踐意識型態」。這可以論證我們的質疑：領導菁英可以藉由調整意識型態的內含，來符合現實政治的需求。意識型態很難視為一套既定的價值觀，並用以影響國家的政治轉型。

這就使得我們對於意識型態的解釋，產生了質疑。誠然，革命性政黨通常有其世界觀，並用以鼓動群眾的革命意願。但在執政後，領導人卻能夠依據時勢需要來調整意識型態的內容，並將不合時宜的成分給封閉起來。換言之，列寧政黨的「意識型態」內涵有可能變動的。國民黨所謂的「還政於民」或共產黨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都有可能被執政者劃為「核心意識型態」，而不必依據這些意識型態的教條來執政。也正是因為這個因素，因此筆者並不認為意識型態是一個很重

⁹ Franz Schurmann, *Organization and Ideology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8), pp. 22-24.

¹⁰ 李英明，*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台北：生智出版社，1999年），頁17-19。



要的解釋項。我們似乎應該把焦點放在更具體的變項，也就是中產階級對於民主化的影響，這個解釋是以現代化理論的視野來看待我們的研究問題。

叁、既有論點：現代化理論的解釋

現代化理論對於民主的解釋，一言蔽之，即經濟發展導致民主。Lipset 在 1959 年的文章，指出經濟發展能導致民主化，因此經濟先進的國家，諸如美國、西歐、北歐等國，民主發展是較為健全的。¹¹ 中產階級在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之間，扮演了聯繫的角色。Moore 認為經濟發展所產生的中產階級，是推動民主化的要件，因此「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制度」(no bourgeois, no democracy)。¹²

經濟發展與民主的推論，驗證在台灣的政治改革。由於經濟的發展，使得中產階級出現了自身利益，進而形成社會分化，進而要求政治參與。1970 年代逐漸興起的黨外勢力，藉由選舉的方式來獲得議會議席次，最終在 1986 年成立民主進步黨，標誌著台灣民主化的新里程。這些現象可以說明台灣在經歷經濟發展後，市民社會逐漸成熟，最終衝擊了國民黨的獨裁體制。¹³ Winckler 觀察台灣在 1970 年代之後的選舉過程，認為制度化與實質參與的程度日趨升，因此台灣的政治發展已經朝向「軟威權主義」(soft authoritarianism)邁進。¹⁴

從台灣的經驗來看，不少學者對於中國大陸的政治民主充滿期待。許多文獻運用現代化理論的視野來檢視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胡少華指出，中產階級會成為在中國成為追求民主化的骨幹。¹⁵ Gilley 認為中

¹¹ Seymour M.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 1959, p. 75.

¹² 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93), pp. 413-432.

¹³ Yu-han Chu, "The Legacy of One-Party Hegemony in Taiwan," in Larry Diamond and Richard Gunther,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66-298.

¹⁴ Edwin A Winckler,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9, 1984, pp. 481-499.

¹⁵ Shaohua Hu, *Explaining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0), p. 150.



國在本世紀之交，會出現 10%至 15%的中產階級，這和美國在 1950 年的 17%與日本在 1975 年的 14%相當，使得中國可能開始產生民主化。¹⁶ Diamond 更認為在 2025 年之前，中國會因為中產階級數量的大幅增加，而使得政治發展朝向民主化前進。¹⁷ 這些著作認為經濟發展—中產階級—民主化，三者的連帶關係是明確而清楚的，大陸的民主改革一定會伴隨著經濟的起飛而到來，使得中共從「發展性獨裁」(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政體轉型為「發展性民主」(developmental democracy)。¹⁸

但現代化理論對於中國大陸的適用性，卻受到許多學者的批判。中產階級對於政權轉型的影響，並未發生在中國大陸。Dickson 透過對新興企業主的研究為例，發現這些資本家偏好的政改是自由化，而非民主化，因為他們需要中共政權提供穩定的環境來繼續發展經濟。¹⁹ Dickson 在另一本著作提出「裙帶共產主義」(crony communism)的概念，認為中共在發展的過程中，試圖去吸納新興中產階級，使得兩者之間產生一種裙帶關係，中產階級支持中共政權的穩定。²⁰ 由此可知，經濟發展與民主化之間的命題，似乎是過於簡單的推論。

此外，依據現代化理論的推測，當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到某種程度時，應該會產生民主化。如果我們以台灣作為大陸的參照組，可以做出更進一步的分析。Gilley 將台灣與大陸的經濟發展與民主發展做了一個對照。他選擇台灣、大陸的兩個時段相同的週期(35年)，也就是 1951 至 1986 年之間的台灣，與 1977 至 2012 年間大陸。Gilly 指出，在對照兩個時段的年限後，發現台灣在 1951-1986 年的經濟程度，大約是大陸在 1977-2012 年間的水準。²¹ 台灣在 1986 年發生了民主化運動，

¹⁶ Bruce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64-65.

¹⁷ Larry Diamond,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New York: Times Books/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8), pp. 231-237.

¹⁸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p. 207.

¹⁹ Bruce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96.

²⁰ Bruce Dickson, *Wealth in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2-23.

²¹ Bruce Gilly, "Comparing and Rethinking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nd Taiwan," in Bruce Gilley and Larry Diamon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Comparisons with*



由此來預期大陸在 2012 年也會產生類似的政治改革，是一個過於武斷的推論。迄今為止，我們看不到中共的政治控制有任何鬆動的跡象。

換言之，現代化理論可以解釋台灣的政經發展，但它對於中國大陸的解釋是相對微弱的。當中產階級的因素不能全面解釋台灣、大陸的個案時，我們應該進一步慎思，是不是有什麼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但卻是我們所忽略的。在反覆思索後，國際因素似乎是一個可以連結的解釋項，特別是美國對於民主化的推動，可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肆、既有論點：美國因素的解釋

用美國因素來看待兩岸的政治發展，是從國際層次的角度來解釋國內政治的變遷。美國的立國精神為政治民主和經濟自由，美國也希望世界其他政權形式符合這種模式。與美國聯繫愈深的國家，愈可能受到美國價值的影響。Levitsky 和 Way 在解釋威權政體的政治轉型時，認為威權國家對於對抗西方民主化的壓力承受性，是一個重要的關鍵。他們認為有幾個因素決定該國能否抵禦西方的壓力，包括該國的國土面積與經濟強度、是否因西方國家對其有相關需求而減緩該國的民主化的壓力（例如中東的產油國家）、該國是否受到特定強國的支持。²² 顯然的，中國大陸對於美國的依賴性，要遠低於台灣。

在 1950 年代，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政權合法性存在危機，需要尋求外在國家的支持。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台灣人民對於國民黨存在敵意，面對這樣的社會，國民黨除了必須發展經濟外，還需仰賴外國力量的支持，特別是美國。美國在 1970 年代前，持續提供了國民黨在軍事、經濟、政治的援助，讓國民黨能夠發展接濟，並在聯合國享有席次以維持法統。²³ 在 1970 年代後，美國開始嘗試接受中共，使得國民黨的正當性受到侵蝕。在這個狀況下，國民黨政府開始大量推行「台

Taiwan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8), pp. 6-8.

²²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41.

²³ 若林正文，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臺北：月旦出版社，2000 年），頁 39-40。



灣化」、「本土化」的政策，加速透過政治吸納的方式來甄補台籍菁英，維繫政權的正當性。²⁴ 國際力量在1980至1990年間，對於台灣民主化尤其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促使蔣經國解除戒嚴，開放黨禁與報禁。

25

相反的，中國大陸對美國的依賴性較低，這可能阻止了美國向大陸散播所謂的美國價值。自中共建政之後，它和美國屬於不同的冷戰陣營。其後，中共更奉行所謂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強調自給自足的宗旨。這些因素都使得中國對美國的依賴性不強。而當前的中國，更是世界上唯一可能與美國分庭抗禮的經濟、軍事、政治強權，美國與中國未來的關係，牽動著世界政經體系最為敏感的神經。²⁶ 美國無法向中國灌輸政治民主等西方價值，自然也能充分理解。

美國因素的解釋看似合理，但仍有其盲點。最大的問題在於美國是否真具備灌輸友邦「美國價值」的強烈動機？美國價值是否便真的代表了美國利益的本質？抑或者，所謂的「民主」只是一個「親美」的代名詞，該國是否親美才真的是美國利益的核心思維，而該國是否推動民主政治並不是美國真正關心的目標。在冷戰時，美國與南韓、台灣、菲律賓、印尼、巴基斯坦獨裁政權維持良好的關係，因為這些國家多是美國的盟友。而上述國家的領導人也多在美國的支持下，繼續鞏固政權。²⁷

即便現今，我們仍看到美國和中東、非洲一些獨裁政權保持良好的關係，並扶植親美的政府繼續執政。換言之，美國因素的解釋是一個看似合理，但仍有其不足的途徑。我們應該從更直接的角度，從政治

²⁴ 王振寰，「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卷第1期，1989年春季號，頁90-91。

²⁵ Jacques deLisle, "International Pressures and Domestic Pushback," in Bruce Gilley and Larry Diamon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Comparisons with Taiwan*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8), pp. 185-211.

²⁶ 相關討論，參見 David Bachman, "China's Democratization: What Difference Would It Make for U.S.-China Relation," in Edward Friedman and Barrett L. McCormick eds., *What if China doesn't Democratize: Implication for War and Peace* (M. E. Sharpe, Inc., 2000), pp. 195-223.

²⁷ Larry Diamond,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New York: Times Books/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8), pp. 111-116.



甄補的角度思考政治菁英與民主化之間的關係。

伍、既有論點：政治菁英的解釋

政治菁英的解釋方式，是認為菁英分裂可能是導致民主化的關鍵。在政治轉型的過程中，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是引領政治轉型的行為者為執政與在野的政治菁英，而非利益團體、群眾組織、社會運動或階級勢力。第二，政治轉型的方向是由這些政治菁英來決定。第三、這些政治菁英會有策略性的結盟與反對。最後，民主化的發生，就是這些政治菁英基於自我的政治利益，而妥協下的結果。²⁸ 也有文獻認為，執政黨的內部菁英是否團結一致，是決定政權是否走向民主化的關鍵。²⁹ 在菁英分裂的情況下，開明派的政治菁英會試圖結合社會力量，來反對保守派的菁英。

在台灣個案上，有文獻提及台灣的地方選舉過程中，甄補了一些台籍菁英

，這可能是影響國民黨內部團結一致的關鍵。吳乃德提出所謂的「菁英二重結構」論，他認為台灣的政治菁英分為統治菁英和地方政治菁英的二重結構。統治菁英指的是佔據重要黨政軍職務的菁英，其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成員為主，這些人多在國民黨在大陸主政時所甄補的菁英，代表著象徵中國的「法統」。此外，以蔣中正為主的政治領袖為了建立班底，將親信的幹部甄補進入統治菁英的層級。換言之，統治菁英的甄補和市民社會的力量並無過多的關係。但在地方政治菁英的部分，由於國民黨在 1950 年代就已經開放基層選舉，因此甄補了台灣籍的政治菁英，³⁰ 使得台灣的政治菁英出現了二重結構。

菁英二重結構可能是影響後來民主化的關鍵。在兩蔣統治期間，

²⁸ Stephan Haggar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in Lisa Anderson ed.,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74.

²⁹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66-67.

³⁰ Nai-teh Wu,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Ph. D. Dis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USA, 1987).



統治菁英的層級並未出現過多的競爭性，且多為大陸籍的菁英長期所佔據；但台灣籍的菁英能甄補進入地方政治菁英的範疇，故而出現了競爭性。政治菁英的二重結構，精準而扼要的說明了台灣在冷戰時期，政治菁英流動的梗概。而菁英的分裂，使得黨內的開明菁英和市民社會的力量做出連結，最後導致台灣的民主化。但在大陸的個案中，除了六四事件，我們很難看出明顯的菁英分裂。菁英分裂的與否，可能開啟了兩岸政治轉型的機會之窗。

陸、兩岸民主轉型的機會之窗

歸結上述的文獻，筆者認為菁英分裂對於兩岸民主化發展的迥異，是比較直接的變項。當然，筆者並不是認為市民社會或國際壓力對於中國民主化，完全沒有任何作用。但筆者認為，只要菁英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立場，則較能抵禦國內與國外的政治壓力，並維繫一黨專政的持續。如果中國大陸迄今，仍保有一群「黨性堅定」的政治菁英，我們似乎能用來說明，為何中國大陸擁有高度經濟發展，以及西方國家的嘗試干預，都無法撼動中共的威權統治。

筆者認為這會是一個有趣，且文獻未曾提及的切入點。我們可以思考一個明晰的問題：為何共產黨一直有一群立場堅定的幹部，而國民黨卻出現了菁英分裂

？只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能進一步知道，為何中共即便歷經國內外的民主化壓力，但統治階層仍能保持堅定，但國民黨卻因為菁英分裂，使得黨內民主派與市民社會做出連結，最後導致全盤的民主化。

一、蘇維埃體制的幹部預備軍制度

為回答筆者的這個問題，或許需要從蘇維埃體制的幹部培育制度去理解。國民黨、共產黨都屬於蘇維埃體制，這種體制通常誕生於政權建立之前。例如蘇聯、中共、國民黨，都是透過革命性政黨來建立新政權。在新政權建立後，黨需要急速配備大量幹部來「控制國家」。在這個窘境下，民主選舉所產生的幹部往往無法應付時局。以蘇聯為



例，在蘇共革命成功後，列寧曾經想採取巴黎公社的民主選舉制度來產生幹部。但蘇聯是一個教育落後的國家，候選人往往是一些軍人、舊官僚，這根本無法應付國家建設的需要。在經過民主選舉的試驗失敗後，列寧開始想要用黨培養的幹部，迅速、全面的接管政府。而蘇維埃體系的「幹部名單制」(nomenklatura)，也由此孕育而生。³¹

為了能迅速提供幹部名單的人才庫，蘇維埃體制會建立青年團的機制，來培訓「青年後備軍」。國民黨與共產黨也走向蘇聯的道路。中國亦是落後國家，民眾教育程度不高，這也迫使國共兩黨揚棄民主選舉，而傾向建立「青年後備軍」，來迅速「控制國家」。因此，兩黨也都有所謂的「團系」，國民黨的團系為青年團，共產黨為共青團。

有趣的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團系，在對日抗戰時期都紛紛坐大，兩黨之間都有嚴重的「黨團衝突」。三青團多次宣布要成為「第二黨」，以作為和國民黨之間的政黨政治。中共也多次批判青年團有「第二黨」的傾向，造成黨團之間的衝突與青年工作的矛盾。³² 共青團也有成為「第二黨」的趨勢，但中共似乎在「延安整風」期間，徹底改造「黨團關係」，批判了共青團的「先鋒主義」，而讓團依附在黨下面。³³ 但國民黨的黨團衝突始終不斷。在 1947 年後，三青團被取消，即便蔣經國在日後建立救國團，但黨團之間似乎仍有許多矛盾。

在中共建政後，共青團一直扮演穩健的幹部輸送功能，但國民黨的救國團在 1960 年代之後，幹部培育的功能逐漸弱化。在毛澤東時期，除了文革的十年，共青團在胡耀邦的領導下，為中共培育了綿綿不絕的青年幹部。³⁴ 但救國團在政府來台初期，亦有強大的幹部培育職能，

³¹ 周尚文，*蘇共執政模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397-407。

³² 舉例來說，國民黨原先有「預備黨員」制度，但後來國民黨取消「預備黨員」，而改採「三青團」來訓練預備黨員。在最初的構想，是由陳立夫提出，他認為「三青團」的培育幹部到了 25 歲，便直接退團，納入國民黨的編制。就好像是中學畢業後，升上大學。但陳誠、康澤等人，有意利用團系來培植勢力，他們反對 25 歲就自動開除團籍的制度，而傾向保留團籍。但這樣卻使得「黨內有團」，用陳立夫的話來說，就是「升上大學後，仍保有中學生的身份」。最後，在派系妥協下，國民黨將「自動退團」的年齡，延到 36 歲。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台北：正中書局，1994 年），頁 225-226。

³³ 馮蘭瑞，「青年團的建立、改造與重建」，*炎黃春秋*，第 10 期，2010 年，頁 28。

³⁴ 唐非，*胡耀邦傳：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231-316。



其對青年思想的管控力量不亞於共青團。但在 1960 年代之後，救國團開始失去其幹部培育的職能，高中軍訓被移至教育部管轄，而 1969 年成立的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也接收了青年輔導的職能。³⁵ 為何救國團在 1960 年代之後迅速喪失其幹部培育的職能？目前並無文獻提出合理的解釋，這恐怕要進行深入的史料查證，才能探究其原因。

二、從團系興衰看政治甄補的重要性

本文提出一個研究的方向：從團系的興衰，去解釋為何台灣、大陸的政治發展歧異。Gilley 認為，台灣與大陸的文化背景有高度的相似性，很適合作為比較的案例。³⁶ 從比較方法來看，兩岸屬於「最大相似設計」(most similar system designs)，³⁷ 也就是在台灣、大陸的政治結構、歷史文化都雷同的情況下，我們要去找尋「關鍵相異」(crucial difference) 的自變項，以解釋為何「依變項」的結果不同。³⁸

從團系的角度，很適合作為這個「關鍵相異」的變項。首先，兩岸都有「團系」，因此這個因素提供了清晰的比較基礎。其二，「團系」扮演了幹部輸送的角色，它對於領導菁英的團結穩定，有非常大的作用。團系的興衰，影響了領導階層的穩固與否，進而導致威權政體是否能夠維繫，抑或發生政治轉型。這個因素對於我們要解釋的依變項來說，具有明顯的「因果機制」(causal mechanism)。

中國青年救國團的成立背景承襲自中國國民黨的組織改造，尤其在中央政府遷台初期，當時反共教育尚未走入正軌，大陸的失敗經驗

³⁵ 李偉松，*蔣經國與救國團之研究 (1969-1988)*，(桃園：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106。

³⁶ Bruce Gilley, "Comparing and Rethinking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nd Taiwan," in Bruce Gilley and Larry Diamon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Comparisons with Taiwan*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8), p. 5.

³⁷ Adam Przeworski and Henry Teague,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Wiley & Sons, 1970), pp. 32-39; Mattei Dogan and Dominique Pelassy, *How to Compare Nations: Strategi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hatham: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1984), pp. 132-143.

³⁸ Elizabeth Nichols, "Skocpol on Revolu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vs. Historical Conjecture," in Richard F. Tomasson ed.,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An Annual Publication*, vol. 9 (1986), pp. 170-171. (163-186).



增加了國民黨對青年運動的危機意識。³⁹1952年，以響應蔣中正在告全國青年書出組織救國團的號召為名，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擬定了救國團籌組原則十二項，送請行政院核准，明定救國團隸屬於國防部總政治部，由蔣經國擔任主任，李煥任主任秘書。救國團的組織採軍隊化的大眾組織形態，各校為大隊，以校長為隊長，再把學生分編為中隊、小隊、分隊，對個別學生而言，加入救國團是形式上的手續，但實際上救國團業務早已成為學校的行政事務。在禁止學生集會結社的年代，只有救國團有權在校園從事宣傳串連的活動。⁴⁰

救國團以青年、學生的動員、控制作為主要工作。而透過救國團的機制，國民黨的影響力進一步往校園及青年學生延伸。救國團除了負責辦理學生軍訓與青年戰鬥訓練外，同時提倡愛國教育與服務活動。團康活動在成團之初就是救國團的重要活動，但初期活動內容均以講述革命工作理論及團務工作研討為主，同時在康樂活動之外也實施生活教育。換句話說，雖然統稱戰鬥訓練，但主要活動仍屬理論性的靜態活動。⁴¹在政治社會化功能延伸下，救國團也成為國民黨內重要的菁英儲備單位。

更具體的說，1969年以前的救國團以兩種方式扮演拔擢青年政治菁英的角色，首先是透過各種區域性與全國性的大型活動，進行基層青年幹部的培養訓練，這些人先在救國團內擔任幹部或者義務幹部進行歷練，之後再被挑選進黨部或者中央政府擔任職務。另外還有一批人，並非在學生時期參與救國團活動表現優越而被提拔，但因為學經歷等條件優越或者具備民意基礎，而被安置於救國團擔任幹部，之後

³⁹ 另有一說認為救國團的成立目的除了控制青年思想，主要是要做為蔣經國的權力基礎，當時的蔣經國受限於陳誠的掣肘，暫時無法進入黨政系統，只能以救國團做為根據地，先壯大自己再圖謀發展。參見陳鳳英，「李鍾桂不過李規李隨而已」，*今週刊*，115期，2005年6月24日，<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v1/content.aspx?a=W20050618901> 以及薛化元，「蔣經國與台灣政治發展的再評價」，*國政基金會國政研究報告*，2008年1月21日，<http://www.npf.org.tw/post/2/3855>。

⁴⁰ 陳鳳英，「李鍾桂不過李規李隨而已」，*今週刊*，115期，2005年6月24日，<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v1/content.aspx?a=W20050618901>。

⁴¹ 陳耀宏，「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後初期的動態活動之概況：民國41（1952）年至民國50（1961）年之動態青年活動」，*體育學報*，第14期，1992年，頁2。



才在政壇上脫穎而出。透過這兩個管道甄補進來的政治菁英涵括本省籍及外省籍菁英，尤其是本省籍政治菁英更如雨後春筍般崛起。⁴²在蔣經國組閣時，包括謝東閔、宋時選、胡軌、胡一貫、鄧傳楷、潘振球等原蔣經國救國團團屬紛紛獲得重用。其時絕大多數的青年國民黨黨員均具備救國團團員身份，許多黨政幹部具備救國團的工作經驗，並也進一步向上擢升。⁴³因此我們認為，1969年以前的救國團確實扮演國民黨青年預備軍的角色。這樣的幹部輸送功能直到救國團向內政部登記為社會運動機構以後才逐步喪失。

對比於救國團在1960年代之後出現的職能轉型，共青團作為共產黨幹部輸送機制的角色則相當穩定，首先，在共青團團章中規定，「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先進青年的群眾組織，是廣大青年在實踐中學習共產主義的學校，是中國共產黨的助手和後備軍。」1995年在中共的「共青團中央機構改革方案」中也規定共青團的職能涵蓋幹部輸送、擬訂青年政策、推動青年工作等項目，具體而言，共青團做為黨的「後備軍」具體表現在兩方面：一為絕大多數黨員原為共青團團員；二為相當多的共青團幹部被輸送到黨的各級領導崗位，成為黨的幹部。⁴⁴自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來，擁有共青團幹部資歷者在黨政領導階層便逐漸取得重要地位，但所負責工作多為傳統黨政部門，直到胡錦濤上任後，團系權力呈現更大幅度的擴展。擁有共青團幹部資歷者晉升中共中央與地方要職者眾，掌管職務部門也由傳統黨政逐漸拓展至經濟工作。⁴⁵

我們認為，從團系興衰看政治甄補間的活化與延續確實是開啟兩岸政治發展的機會之窗。筆者並不是完全否認意識型態、經濟因素、美國因素是不重要的變項，但放置在兩岸比較的框架下，團系興衰較

⁴² 李偉松，**蔣經國與救國團之研究 (1969-1988)**，(桃園：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100-101。

⁴³ 陳鳳英，「李鍾桂不過李規李隨而已」，**今週刊**，115期，2005年6月24日，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v1/content.aspx?a=W20050618901>>。

⁴⁴ 寇健文，「胡錦濤時代團系幹部的崛起：派系考量 vs. 幹部輸送的組織任務」，**遠景基金會季刊**，第8卷第4期，2007年10月，頁50-51。

⁴⁵ 企畫室主編，「共青團發展概況簡析」，**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2008年8月，
<<http://www.people.com.cn/GB/jingji/1037/2904445.html>>。



之上述三個因素，可能是相對重要的。我們的研究也可以彌補文獻的一個不足。文獻認為菁英的分裂，可能會開啟民主化的契機，但卻鮮有文獻說明：為何領導菁英會出現分裂？我們嘗試回答：一旦政權體系無法培育充分的後備幹部，而必須甄補「黨外」人士，就有可能會在未來造成菁英的分裂，誠如 1970 年代末期的台灣。這項研究，將有助於我們對於兩岸政治發展、菁英政治理論、民主化理論、威權轉型理論，做出更為精緻的討論。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王振寰，「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卷第1期（1989/春季號），頁71-116。
- 朱昌淩，「三民主義和政治發展：對中華民國及中共民主發展的觀察」，張京育主編，*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海峽兩岸的實踐與比較*（臺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年），頁57-72。
- 任卓宣，*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臺北：帕米爾書店，1979年）。
- 企畫室主編，。「共青團發展概況簡析」，*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2008年8月，<http://www.people.com.cn/GB/jingji/1037/2904445.html>。
- 李英明，*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臺北：生智出版社，1999年）。
- 李偉松，*蔣經國與救國團之研究（1969-1988）*（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 吳乃德，「人的精神理念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美麗島事件和台灣民主化」，*台灣政治學刊*，第4期（2000年12月），頁57-103。
- 周尚文，*蘇共執政模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 若林正文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灣——分裂國家と民主化）（臺北：月旦出版社，2000年）。
- 唐非，*胡耀邦傳：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 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1994年）。
- 陳耀宏，「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後初期的動態活動之概況：民國41（1952）年至民國50（1961）年之動態青年活動」，*體育學報*，第14期（1992年），頁177-192。
- 陳鳳英，「李鍾桂不過李規李隨而已」，*今週刊*，115期（2005年6月24日），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v1/content.aspx?a=W20050618901>。
- 馮蘭瑞，「青年團的建立、改造與重建」，*炎黃春秋*，第10期（2010年），頁25-30。



唐勃，*中共共青團之研究*（臺北：幼獅文化，1986年）。

寇健文，「共青團幹部與中共政治精英的甄補：團中央常委仕途發展調查」，*中國大陸研究*，第44卷第9期（2001年9月），頁1-26。

寇健文，「胡錦濤時代團系幹部的崛起：派系考量 vs. 幹部輸送的組織任務」，*遠景基金會季刊*，第8卷第4期（2007年10月），頁49-95。

薛化元，「蔣經國與台灣政治發展的再評價」，*國政基金會國政研究報告*（2008年1月21日），<http://www.npf.org.tw/post/2/3855>。

二、英文部分

Bachman, David, "China's Democratization: What Difference Would It Make for U.S.-China Relation," in Friedman Edward and Barrett L. McCormick eds., *What if China doesn't Democratize: Implication for War and Peace* (M. E. Sharpe, Inc., 2000), pp. 195-223.

Browsers, Michaele L., *Political Ideology in the Arab World: Accommod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Brindley, Thomas A., *The China Youth Corps in Taiwan* (New York: Peter Lang, 1999).

Cheng, Tun Jen,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Vol. 41, No. 4 (1989), pp. 471-499.

Chou, Yangsun and Andrew J. Nathan, "Democratizing Transition in Taiwan," *Asian Survey*, Vol. 27, No. 3(1987), pp. 277-299.

Chu, Yu-han, "The Legacy of One-Party Hegemony in Taiwan," in Larry Diamond and Richard Gunther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Delisle, Jacques, "International Pressures and Domestic Pushback," in Gilley Bruce and Larry Diamon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Comparisons with Taiwan*.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8).

Dickson, Bruce,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Dickson, Bruce, *Wealth in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Diamond, Larry,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New York: Times Books/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8).
- Fung, Edmund S. K., *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Gilley, Bruce,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 Gilly, Bruce, "Comparing and Rethinking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nd Taiwan," in Gilley Bruce and Larry Diamon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Comparisons with Taiwan*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8).
- Gunther, Richard,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 Haggard, Steph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in Anderson Lisa ed.,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Heywood, Andrew, *Political Ideolog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Macmillian Education, 1992).
- Hu Shaohua, *Explaining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0).
- Levitsky, Steven and Lucan A.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Lipset, Seymour M.,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1959), pp. 69-105.
- Mattei, Dogan and Dominique Pelassy, *How to Compare Nations: Strategi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hatham: Chatham House



- Publishers, 1984).
- Moore, Barrington,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 Beacon Press, 1983).
- Neumann Matthias, 2008. "Revolutionizing Mind and Soul? Soviet Youth and Cultural Campaigns during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1921-8," *Social History*, Vol. 33, No. 3, pp. 243-26.
- Nichols Elizabeth.,1986. "Skocpol on Revolu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vs. Historical Conjecture," in Richard F. Tomasson ed.,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An annual compilation of research*. Greenwich, CT : JAI Press.
- Przeworski, Adam and Henry Tenue,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Wiley & Sons, 1970).
- Schurmann, Franz, *Organization and Ideology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8).
- Winckler, Edwin A.,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9(1984), pp. 481-499.
- Wu, Nai-teh,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Ph. D. Dis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USA, 1987.

